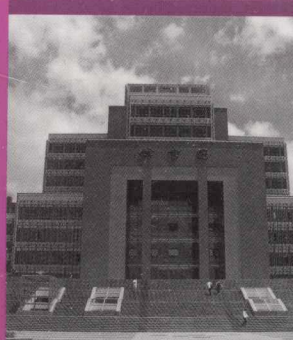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 意识形态冲突

张云莲/著

Ideological Confli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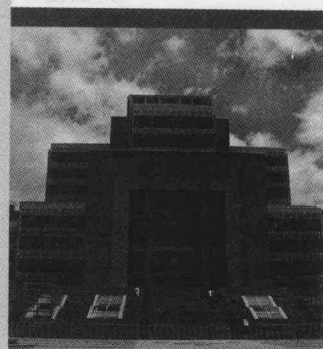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013069616

D5
171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 意识形态冲突

张云莲/著

Ideological Confli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北航

C167682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 / 张云莲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7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4695 - 0

I. ①冷… II. ①张… III. ①国际政治—社会意识形
态—研究—现代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3710 号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

著 者: 张云莲

责任编辑: 朱 然

责任校对: 邓永飞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52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ranmuc@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4695 - 0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意识形态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是一个经年不衰的热点。不同学科的人都可以研究意识形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我所在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来说，这无疑也是我们的份内之事。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本书的研究却超出了我的一般知识背景。

不错，本书的作者张云莲是我的学生，眼前这本书是她的博士论文的扩展版。但是，老师并非就比学生高明，老师对于自己“指导”过的论文在出版时也并非总有充分的把握加以评论。尽管这个题目是我给她出的，但不是根据我的知识背景，而是根据她的知识背景出的。因为她原来曾在清华大学韦正翔教授的指导下做过有关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并写成了相关的硕士论文。我只能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结合起来。有些专家告诉我，这样的题目很好，很有意义。回头看来确实如此，但当初确定这样的题目，我自己是有些无奈的。我原来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限于国内，没有把眼光放大到国际上去。经过指导张云莲的论文，倒使我有意识地扩展了专业的视野。

冷战后国际上还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果有的话，是否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而加以研究？对此并不是没有一点疑问的。张云莲在读博期间曾去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一年，在那里接触了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曾就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结果是有的教授认为论文不值得做，因为据说冷战后国际社会已经意见一致，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冲突了，不值得大动干戈研究一番。当她把这样的信息传回国内，我也一度有些疑惑。但是，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早就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遇到的意识形态压力，看到国际社会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风云变幻。于是，我找到一篇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以此坚定她的信心。现在看来，坚持下来无疑是对的。



本书以国际化的视野,研究了冷战后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这些关系当然并不都是冲突,但无疑包含着冲突。而如果不把握这种冲突,就不能揭示国际关系中尖锐的一面。而研究如果不能揭示事情尖锐的一面,文章写出来就不可能犀利。本文聚焦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这一冲突的真实存在和基本表现,特别是剖析了构成意识形态冲突焦点的若干问题。并且,探讨了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中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提出了崛起的中国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对策思路。所有这些,文中都有较好的阐述,我就不多说了。

博士毕业之后,张云莲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也许她对其工作单位的感情起了作用吧,今年我的一个博士毕业生王威,也是她的师弟,也要去昆明理工大学工作了。很巧,我另一个今年毕业的博士生柳丽也在昆明找了工作,是云南师大。这样的“扎堆”现象不多见,对我来说是又惊又喜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我愿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就像四季如春的昆明城那样,充满朝气,蒸蒸日上。而这,其实也是对我们国家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的祝愿和期待。

刘建军

2012年7月3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序 二

当张云莲诚邀我为本书作序时，我欣然应允。本书是她从事国际政治研究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也是基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充实而成的。作为她的硕士生导师和把她引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人，看到她能顺利地撰写完这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心中颇感欣慰。

从整体上说，本书是一部立意较高，角度较新，具有一定前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难得佳作。我在读完本书后，觉得它有五个方面的优点。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比较难驾驭的题目，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生，要写好它有一定的难度。当作者告诉我她的这个选题时，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生怕她写不好。因为探讨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涉及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文化学、伦理学、市场营销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知识，要想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本书作者不是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虽然她硕士阶段的学位论文是国际政治伦理方向的，但那是研究个人思想的，相对要容易一些，现在要写20多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难度是比较大的，她是否能把握好写这个题目的角度和方向，不要把它写成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论文或者是一个大杂烩式的学位论文，对她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从本书完成的情况来看，作者能够把多年学习、教学和研究积累起来的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很好地迎接了挑战，准确把握了整本书的角度和方向，使本书给人一种体系完整、各部分衔接顺畅，论述有条理，层次清晰，知识面宽厚，文笔流畅的感觉。这是本书的第一个优点。

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则更为复杂。冷战时期人们对美苏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但冷战



后国际社会是否还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国内外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国际政治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基本消失,现在已经没必要研究这个问题了。另一种观念认为,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结束,只不过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因而斗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研究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其实,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冷战后并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因为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价值体系,还是作为一种利益的代表,亦或是一种具有极大动员力的政治工具,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有重要的价值,是影响国际关系和改变世界格局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本书能够清楚地看到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存在,能够前瞻性地预见到不远的未来国际社会中将出现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问题,也看到了冲突背后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是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从理论上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严重不足,并且未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系统地阐述这个问题的作品;从现实主义看,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在国际社会中如何行为的问题,因此本书研究的问题是学科前沿问题,成果的创新水平属国内领先,具有开创性,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优点。

本书体现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创新意识和敢于迎接挑战的勇气。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把研究的视野放在国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国内的思想教育问题,对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相对比较陌生。本书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以很大的勇气挑战自己的学科知识背景,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力求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以意识形态概念为切入点,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扩大到国际政治领域,而且抓住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但却是人们容易看不清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这些体现了作者在学术追求上具有既注重借助前人思路 and 成果,又力求有所创新,既关注理论探索也关照社会现实的学术品格。这是本书的第三个优点。

学以致用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本书对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冲突原因的分析上,而是对冲突和斗争的新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时代整合,拓宽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渠道,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和平发展的形象,注重对外传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功能等多方面来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策略。尤其是书中提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不能只是防御性的，而应该把攻防结合，并且维护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事，也需要关注和争取普通民众，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宗教传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努力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增强人们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与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等思路具有创新性。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视角，是本书的第四个优点。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借助前人的成果。一部著作的写作也同样如此。本书在写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史料，让人感觉资料相当丰富，论证的支持材料较多。本书的内容涉及多学科领域，作者在写作中参考和查阅了国内外多学科领域中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给人以论据非常充分，论证有力之感。从本书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十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注重如实反映引文信息，表现了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因此，科研作风严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是本书的第五个优点。

当然，本书作者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还可以再细致和深入一些，对个别问题的论述还可商榷，对策的提出也还可以再细化。但作为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其出版无疑可以为人们解读复杂的国际政治提供一种思路，也可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更有益于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我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八年期间，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际政治伦理，作为中国的国际政治伦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出版了《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国际政治的全球化与国际道德危机：全球伦理的圆桌模式构想》等著作。自2008年调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来，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马克思的原版著作，无暇顾及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张云莲是我指导的唯一一位研究国际政治伦理的硕士生，期待作者以此书为其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问题的基石，沿着这条路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韦正翔

2012年7月13日于清华大学善斋



CONTENTS 目录

绪 论 / 1

- 一、关于本书所研究的问题 / 1
- 二、本书所研究问题的意义 / 5
- 三、本书研究问题的成果综述 / 8
-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18

第一章 意识形态激荡的国际舞台 / 21

第一节 各抒己见的意识形态观 / 21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概念 / 21
- 二、西方学者眼中的意识形态 / 24
- 三、中国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 27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角色 / 30

- 一、国际政治的涵义 / 30
- 二、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涵义 / 32
- 三、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 35

第三节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及结束 / 38

- 一、冷战缘起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 38



- 二、意识形态对抗是冷战的突出特征 / 41
- 三、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的新走向 / 44

第二章 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变化 / 48

第一节 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边缘化” / 48

- 一、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 / 48
- 二、以国家利益为纽带的国际关系 / 50
- 三、国家利益凸显中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幻象 / 53

第二节 意识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弱化” / 56

-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依存与合作 / 56
- 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发展 / 58
- 三、经济全球化中虚幻的意识形态淡化 / 59

第三节 意识形态冲突并未终结 / 62

- 一、意识形态化的“语言符号” / 62
- 二、意识形态冲突形式的变化 / 64
- 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 68

第三章 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 / 72

第一节 意识形态冲突中的民主 / 72

- 一、“民主”的来源与内涵 / 72
- 二、关于民主模式的普世性 / 76
- 三、关于普选式民主 / 81

第二节 意识形态冲突中的人权 / 84

- 一、“人权”的提出 / 84
- 二、人道主义干涉理论 / 88
- 三、美国的人权外交 / 91

第三节 意识形态冲突中的民族主义 / 97

-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 97
- 二、民族主义的狭隘性 / 100
- 三、中美民族主义比较 / 105

第四节 意识形态冲突中的宗教 / 111



- 一、宗教的产生及回归国际舞台 / 111
- 二、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 / 116
- 三、以宗教名义实施的恐怖主义 / 120

第四章 冷战后意识形态的传播 / 125

第一节 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传播 / 125

- 一、强势价值观传播与和平演变战略 / 125
- 二、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 128
- 三、意识形态传播的“热战”和“隐形战” / 131

第二节 东方价值观的温和传播 / 134

- 一、韩国价值观的影视化效应 / 134
- 二、日本“文化立国”中的价值观传播 / 136
- 三、其他东方国家价值观的传播 / 138

第三节 文化交流与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传播 / 140

- 一、文化交流的传播形式 / 140
- 二、大众媒介的传播力量 / 143
- 三、互联网的独特影响力 / 149

第五章 中国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策略 / 152

第一节 捍卫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 152

- 一、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 152
- 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整合 / 155
- 三、拓展意识形态传播和教育的有效渠道 / 158

第二节 树立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 / 160

- 一、推出国家形象以消解“中国威胁论” / 160
- 二、国家形象推出的整体框架 / 164
- 三、全面解说中国成功的经验 / 167

第三节 传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 170

- 一、传扬中华文化是和平发展的需要 / 170
- 二、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 172
- 三、高扬“和谐世界”观念，维护世界和平 / 176



第四节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功能 / 179

-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活动 / 179
- 二、继续完善针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181
- 三、进一步创新有利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 184

结语 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的冲突与包容 / 187

- 一、意识形态是一套关于社会秩序的观念 / 187
- 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 / 189
- 三、相互包容是国际社会避免意识形态冲突的解决方法 / 191

参考文献 / 194

后 记 / 208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时更多表达的是合作与共赢的愿望，探讨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冷战时使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和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即便是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宣布要以是否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为划分敌友的界限，国际社会也没有出现冷战时那样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现象。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也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更加紧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加常见和广泛。这就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否已经淡化甚至退出了历史舞台？局部地区冲突不断到底是什么原因？恐怖主义攻击的矛头为什么主要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这种矛盾是否可以化解？西方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等提法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形式？中美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争论属于什么性质的？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已经回归国际舞台和它将对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否是庸人自扰？本书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国家下一步如何在国际社会行为提供一种思考，为人们认识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野，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种思维的新角度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

本书以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语境中,意识形态是指以国家或利益集团为国际社



会行为主体并被赋予国家（或民族）政治历史使命感和利益归属性的价值观念、思想学说、伦理道德的一系列信念体系和相关准则的有机综合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扮演着巨大动员力、隐性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和民众对外交政策支持度的角色，因而它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改变世界格局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

就国际社会而言，冷战爆发的表面原因和冷战的突出特征是意识形态对抗，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争夺地缘政治优势，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夺霸权的较量，意识形态成为双方力量抗衡的思想武器。冷战后，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外交事务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似乎给人一种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淡化甚至是消失的感觉。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因为各个国家建构社会秩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的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而人们长期接受社会教化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是不同的，在国家交往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不同国家的人们对权力、道德、经济利益和自然资源等的价值评价存在差异，对获取手段和途径的道德评价存在分歧，对人权和民主的普遍化和特殊性的认识有差异，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途径和相互尊重与包容之心，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难免重演，只是时代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冷战后局部地区的暴力冲突不断，种族冲突不断，从一个侧面表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人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隔阂。同时，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优势、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使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冷战后，民主、人权、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是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冲突的主要焦点。西方把它的民主模式看成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认为普选式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中国认为民主模式多种多样，普选式民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推进民主进程，这使中美之间在制度模式选择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关注人权和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如果把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就使“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具有了霸权性质。美国的人权外交自卡特政府以来一直在延续，虽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始终如一。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凸显时



会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产生负面作用。中美民族主义各具特色,但美国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追求世界领导者的诉求和为自身安全而寻找潜在敌人的行为,使美国在国际社会处于尴尬的境地和自身安全面临挑战。宗教在冷战后出现了回归国际政治舞台的现象,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宗教的影响,并且在当今国际社会似乎还形成了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态势,这使宗教在国际社会出现了再政治化的迹象。

在国际政治领域,冷战前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理论观点。“民主和平论”把民主政体作为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障,认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已经克服了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自由民主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①这两种观点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看成是世界上最好和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制度,是世界最终的意识形态。“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让位于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全球政治开始按照文化线被重构,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使它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中国和伊斯兰的冲突,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西方的国家和潜在对手,儒教文明将和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来共同挑战西方。^②这一观点虽然明确否认意识形态冲突的存在并用文明的冲突来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文明或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文明冲突的实质依然是意识形态冲突。上述理论的提出,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存在的事实和冷战思维的难以根除。

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根据意识形态安排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因而意识形态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关节点和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冷战时中美两国出于战略利益考虑而建交,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意识形态鸿沟一直存在。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把自己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设定为苏联,那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东亚正在快速

^① 参见弗兰西斯·福山著、本书翻译组译:《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序论第1页。

^②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7、102页。



发展的区域大国和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就可能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对手和全球战略利益的威胁者，中美关系很难摆脱冷战思维的思维定势。虽然中国希望中美关系能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而真诚合作，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差异使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双边关系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中美之间一系列冲突背后仍然可以看到冷战思维的影子。

西方的文化扩张是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各自的认同来源于不同的文化渊源。人类社会虽然在有关基本的社会生存准则，如不偷盗、诚实等问题上有着基本的价值共识，但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异质性往往大于同质性，因此世界是文化多样性的。一般来说，文化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冲突与斗争，但如果一方非要强迫另一方接受其价值观，并希望通过文化渗透或军事干涉等方法进行和平演变或实现政权更迭以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则冲突难以避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强东弱的国际政治话语权态势和文化传播格局，客观上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便捷条件，它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当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并可能威胁到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时，维护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捍卫意识形态安全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就中国而言，积极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整合和拓宽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是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策略的基础。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实施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积极推出国家和平发展形象，努力消解“中国威胁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功能，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也是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需要。

上述围绕意识形态冲突问题所产生的国际社会现象和理论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具有非凡的价值和影响力。事实上，意识形态作为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交流的当然政治语言^①，它不可能淡化和消亡。正如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知名学者王缉思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作为建立在一定

^① 姜安：《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导论第3页。



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系统的思想观念，它虽然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他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但作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指导阶级或集团行为的观念体系，它只可能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却很难被真正“淡化”，更不可能消亡。^①因此，只要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冲突，一种意识形态硬要征服或消灭另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必然存在，只是这种冲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改变。

二、本书所研究问题的意义

（一）有益于解读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第一，冷战后国际社会出现了局部地区的暴力冲突和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态势。如何解读这些国际社会的新变化和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是非国际政治专业的人们碰到的困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权力的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满足、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欲和信仰的征服，使人类历史充满了暴力冲突与和平的博弈。如果说冷战的高压环境使国家之间对权力、经济利益、自然资源和信仰的追求被囚禁在两大阵营的牢笼里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之后，这些欲望就成了无拘无束的流浪汉，它们在国际政治的真空中寻找自己的栖息地，宗教和种族问题成为了政治精英动员人们进行相互厮杀和争夺生存空间及权力欲望满足的工具。无论这种暴力冲突是发生在巴尔干半岛还是在中东地区，也无论这种冲突是发生在西方国家和中东国家之间还是其他的国家之间，它们的背后总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子。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所有外交问题从来就没有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②因此，本书对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人们认识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提供一种认识的途径。

第二，“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提出，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消解，它使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冲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凸现出来。“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都围绕着对西方民主的赞许这一中心内容，从不同的角度把西方民主政体推崇到人

^① 参见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② 姜安：《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页。